

## 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進路探究

歐宗明\*

### 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所採用之取向，並從考察當代西方史學的演變進程中，提擬未來擴增新的研究進路。經分析和考察發現臺灣體育運動史多採科學的和客觀的取向，以及相對的和反客觀的取向來進行史學研究，這些取向的歷史觀點均後設歷史為一直線發展的形式，亦形成評定史學研究單一的和獨尊的標準。但自從新史學觀點出現後，歷史被認為是多層次、多視角、多樣貌、多元性的立體形象，研究者可從多元的視角切入，採用不同的方法，針對提問進行回答，綜合性及總體性地來瞭解欲探究議題之全貌。是以本文提擬現有的研究取向外，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應再擴增綜合的及總體的研究取向，跨領域與各種人文及社會科學做整合性的探討，以深化體育運動史研究的影響力。

**關鍵詞：**體育史、運動史、研究取向、史學史、歷史哲學

---

\*歐宗明，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oz@mail.ntin.edu.tw

## The Study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History in Taiwan

*Tzong-Ming Ou*\*

###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PE) and sport history, to examine the change of the historical thought in West, and explore a new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f PE and sport. After the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The mainstream historical research of PE and sport in Taiwan was the “scientific & subjective” and “relative & anti-objective” approaches. These approaches thought the history was the mode of linear development and the judg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were unique. After the movement of New History, the history was thought as multi-face, multi-dimension and multi-vision. The researchers could answer the questions by multiple ways and different methods. Therefore the issue could be understood holistically and synthetically. The conclusions were to propose the “holistic & synthetic” 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

**Keywords:**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 history, research approach,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philosophy

---

\* Tzong-Ming Ou,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nan Institute of Nursing.

## 一、緒論

體育與運動史是記述以往人類體育活動的真相和演進的歷程，並探究其因果關係，供給今人和後世作為資考，以求今後體育運動無限發展的科學<sup>1</sup>。瞭解體育與運動的歷史，是一種尋根的態度，探索先人智慧，藉以博覽視野，增長見聞，並培養思辨的方法，進而深層理解歷史事件所蘊含的意涵<sup>2</sup>。是以，臺灣自創設體育科系所以來，體育史就列為其必修的專業課程內容之一，體育運動史一直被認為是體育、運動從業相關人員必備的專業知識及人文素養。可見此學科在形構體育和運動領域專業上，有其重要的專業知識成分。而在體育和運動學術研究上，透過史學研究進路對體育或運動的發展過程進行深入的探索和考察，亦已成為體育運動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途徑。

二次大戰後，臺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始於吳文忠先生，吳氏於 1957 年完成《體育史》一書，迄今仍是大專體育相關科系重要的參考讀本。1970 年臺灣成立體育研究所，在吳氏的領導下成立「體育史學研究室」之後，始進入體育運動史研究人才的系統培育，開啟臺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之先河。其後樊正治先生接續吳氏之研究工作，戮力從事體育運動史相關研究工作。1980 年代末，由許義雄先生率領的體育思想史研究社群，開始蓬勃地發展。1990 年成立博士班，適逢蔡禎雄先生自日本學成歸國，接續吳氏主持該研究室。在這些體育運動史研究帶領者的播種下，研究主題上逐漸廣泛，同時也培育出更多史學研究人才。多年來，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以事件或主題敘寫為大宗，依據各作者所設定的年代、時段、人物、觀

<sup>1</sup>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1。

<sup>2</sup> 徐元民，《體育史》（臺北：品度出版社，2005），7-9。

點、事件，按時間軸序來介紹某一區域、項目、時段、主題的運動相關事物之發展。體育思想史方面之研究成果亦甚多，其較重人物、思想、觀點形成之背景、演進和影響。其他如運動賽會史<sup>3</sup>、傳統運動<sup>4</sup>等研究亦有學者投入。研究成果上較聚焦於運動事件或體育活動的源起及其演變的來龍去脈，偏向歷史事實的鋪陳，及其相關細節的陳述——相對而言，較缺乏體育、運動與社會結構、區域文化和時代精神的深入探索及分析。

體育運動史屬於史學研究一支，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基礎理論皆採自一般史學研究<sup>5</sup>。臺灣史學研究之基礎觀念及研究方法多源於西方史學相關論點，研究進路亦追隨西方史學思潮。若欲在現今的研究之外有更豐碩的成果，則現有研究進路應要有所突破創新。從當代西方史學潮中探索可能出路，則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處。是以本文擬進行史學研究途徑及限制分析，並考察當代史學發展，以進一步探索及提擬不同以往之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進路。

## 二、研究取向探查

### (一)科學的和客觀的取向<sup>6</sup>

歷史是必須忠於史實的人事，史學則可被視為順應時間的脈絡，探討

<sup>3</sup> 運動賽會史研究包含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省（區）運動會、遠東運動會、亞洲運動會……等運動賽會之演變及參與情形。

<sup>4</sup> 傳統運動指各族群相沿承襲的各項身體活動，通常這些活動大多尚未經過運動標準化過程。

<sup>5</sup> 更詳細之討論請參閱蔡禎雄，〈體育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編）（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47-54。

<sup>6</sup> 有關科學的和客觀的史學觀念之發展請參閱歐宗明，〈近代西方史學思潮變遷（1830~1980）〉，《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3.2（臺南：2009.10）：65-67。

過去人類活動，注重事實的記載<sup>7</sup>。換句話說，史學所標榜的研究主題是變遷<sup>8</sup>。由於要注重歷史事實，因此有一些史學家主張，史學的中心工作即是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此即所謂的史料學派的觀點<sup>9</sup>。史料學派史學家為杜絕一切文學或哲學對史學的影響，把史學研究完全限定在對材料的蒐集、整理和考訂方面<sup>10</sup>。根據傅斯年的說法，可以對此種史學的觀點與方法有更加清楚的瞭解：

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連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果然，我們同仁中也有些在別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sup>11</sup>。

此種觀點係承襲十九世紀 von Ranke 所創之科學的史學，認為史學家只需浸淫於史料中即可重建史實。其主要的研究特徵為實徵性和經驗性，透過嚴謹的史料考證，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如實重現歷史，因此僅能依據史料，透過客觀的描述和敘寫，讓史實自行發聲。

此種研究途徑係受實證主義影響，歷史學家中的實證論者 (positivists) 因而宣稱歷史是一種科學，主張要在歷史研究中探知事實的真相，然後再

<sup>7</sup> 張華蓀，〈歷史社會學〉（臺北：三民，1993），1。

<sup>8</sup> 盧建榮，〈梁啟超，您安息吧——新歷史研究法讀本的出爐〉，《歷史學與社會理論》（江政寬譯）（臺北：麥田，2002），12。

<sup>9</sup> 有關史料學派觀點之闡釋請參閱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1988），2-13。

<sup>10</sup>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 1950-2000〉（臺北：麥田，2002），22。

<sup>11</sup>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史研究方法論集》（魯弓長編）（臺北：泰華堂，1974），156。

從中獲取結論，此種宣稱加重了對事實崇拜的影響力。因為實證主義的知識論觀點正是主張二元論，以主／客對立的方式，獲致客觀的真理，其研究的主要特徵是實證性和經驗性的<sup>12</sup>。故其先決條件是將主體與客體完全分開，亦即歷史學者只能針對所得之史料，加以編織組織，不可加上撰寫者個人之解釋及觀點，將史實疏通後，史實將會告知我們想要的答案，就如同簡明牛津英文辭典將「事實」定義為：有別於來自結論的一種經驗性資料之定義。此即其會被稱為通俗歷史觀之源由，依此觀點歷史是由一組已探知真相的事實所組成。簡言之，史料學派即以 von Ranke 為首，期以科學方法，致力於史料蒐集和考證，認為只要蒐集到完整的史料，史學家依據史料說明事實真相，便可建立如自然科學般的定律。

在臺灣體育運動史領域中，持此種史學研究觀點的代表作品，專著有吳文忠的《體育史》、《中國近百年體育史》、《中國體育發展史》<sup>13</sup>，及蔡禎雄的《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sup>14</sup>。吳氏在從事體育史研究時相當重視史料之蒐集，經常四處蒐羅體育相關的一手史料，加以整理和著述<sup>15</sup>。從吳氏著作可發現，其對體育史料的蒐集鉅細靡遺，對所蒐集之史料分門別類加以述明各項史實，相對史實評述則相當少，且內容多以相關法令、官民組織、體育政策、場館興建、運動賽會等為主，鋪陳架構亦多以國家政治重大事件為時期切割點，內文敘寫上則較多官方觀點及政策推行者立場，相當符合史料派史學作品風格。此種風格與吳氏早年留學日本時<sup>16</sup>，日本史學研究以科學史學

<sup>12</sup> 有關實證主義知識論的討論，請參閱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臺北：心理，2001），23-24。

<sup>13</sup> 《體育史》、《中國近百年體育史》、《中國體育發展史》均為吳文忠作品，出版時間依序為1957、1967、1981，其詳細目錄請見參考文獻。

<sup>14</sup> 《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為蔡禎雄作品，出版時間分別為1995和1998，其詳細目錄請見參考文獻。

<sup>15</sup> 蘇瑞陽，〈體育宿者——吳文忠博士〉，《國民體育季刊》，20.3（臺北，1991.09）：54-59。

<sup>16</sup> 吳文忠係日本國立體育研究所碩士，曾留學日本，留學期間勤於蒐集論文資料，當

傳統為主的研究風格相似，亦與中國傳統史學，及當時臺灣史學家所持的著史觀點相似<sup>17</sup>。蔡氏亦留學日本，受此學派觀念影響亦深，歸臺後與臺灣史學研究主流觀念亦相同，是以其有關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和師範學校體育科的考察等一系列著作，亦以此種研究觀點完成<sup>18</sup>。蔡氏著作與吳氏著作略有分別，吳氏聚焦中國史的軸線，作品內容多為中國史觀下有關體育相關史實之敘事；蔡氏則以臺灣史為主體，除體育相關史實敘述，為求全盤瞭解相關史實之發展脈絡，內文亦論及社會背景因素，如教育政策、學校教育實況等。在蔡氏兩本有關臺灣學校體育發展史中，蔡氏以學校體育的實施為分析中心，其外有學校教育政策之分析，再外有國家治理政策及社會氛圍之分析，形成由外而內三段式同心圓式的分析架構，是以論述分析及研究視野均較為完整。吳氏與蔡氏均任教臺灣師大體育學系所，在兩者先後嚴謹治學及嚴格督導下，培育出不少優秀之體育運動史研究人才，這些吳氏與蔡氏的學生遂成為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社群中的主流成員<sup>19</sup>，為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立下了重要根基。

## (二)相對的和反客觀的取向<sup>20</sup>

Collingwood 認為過去不是史學家憑知覺即能經驗地了解的既定事

---

時著名的體育史學名著、英文、德文版的體育史及中國歷代體育主要古籍，均在其搜羅之列。有關吳氏學經簡歷請參閱《中國體育發展史》封面內頁。有關其生平及學術成就之評論請參閱許光熙，〈吳文忠的學術成就及其《體育史》所蘊涵的史學理論〉，《國立臺灣體育學報》，2（臺中，1998.06）：29-68。

<sup>17</sup> 有關中國、日本和臺灣史學研究學術交流之討論，請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3-42。

<sup>18</sup> 蔡氏對於史學研究的主張及對自己研究派別屬性之陳述，請參閱蔡禎雄，〈體育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47-66。另在蔡氏三位門生李建興、劉宏裕和陳耀宏聯合撰寫之〈蔡禎雄體育運動史方法論建構之敘說研究〉文章中，則直接指出蔡氏為邏輯實證經驗論的實踐者。

<sup>19</sup> 有關兩人培育之人才請參閱王建臺，〈臺灣體育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36.2（臺北，2007.06）：7-9。

<sup>20</sup> 有關相對的和反客觀的史學觀念之發展請參閱歐宗明，〈近代西方史學思潮變遷（1830~1980）〉，《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3.2：67-70。

實，歷史是過去經驗的重演<sup>21</sup>。他提出下列三個史學論點：

一是歷史上的事實傳到我們手裡時絕不會是純清的 (pure)，它們常是透過記錄者的心靈而反射出來的；二是歷史家對所討論人物的心境和他們行動背後的思想應具富有想像的理解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三是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瞭解過去<sup>22</sup>。

他亦宣稱：「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sup>23</sup>。依此觀點，史學被指為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sup>24</sup>。史學的主要任務則是以系統的觀點通釋歷史的全程，也成了余英時所言之史觀學派的基本觀點<sup>25</sup>。此處所謂的「史觀學派」是相對於史料學派而言，其研究進路係在既有的史料上加入研究者本身對史實的詮釋，或研究者依某一預設理論之觀點進行史實的詮釋。故若再加以細分，前者可名之為「史釋學派」，思想史的研究可歸為其中，後者則是名符其實的「史觀學派」，如以 Karl Marx 的唯物史觀來解釋歷史事件。

針對 Collingwood 的三個論點，英國史學家 Carr 認為這些歷史觀點是危險的，此種觀點將使歷史可以因人之不同而有無數的意義，此種論調與沒有客觀的歷史真理是一樣的意思，但兩者都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歷史事實上解釋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地位，雖然因為現存的所有解釋中沒有一個完全客觀的解釋，我們並不能說所有解釋都有一樣的價值，或說歷史事實原則上不能有客觀的解釋<sup>26</sup>。Carr 因而認為歷史是史學家和事實之間

<sup>21</sup> Robin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282.

<sup>22</sup>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24-29.

<sup>23</sup> Collingwood, Robin G., *The Idea of History*, 215.

<sup>24</sup> 周樑楷，《歷史學的思維》(臺北：正中，1993)，12。

<sup>25</sup>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1988)，2。

<sup>26</sup> Carr 針對 Collingwood 所提三個史學論點的詳細批判內容，請參閱 Carr, Edward H., *What Is History*, 30-31.



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終止的對話<sup>27</sup>。受他們的啟迪，思想史研究於是開始蓬勃地發展。

思想史的研究路線在體育學術上開闢了一個深入探索人文思想的領域，對古今體育思想可以給予現代的命義與價值判斷<sup>28</sup>。在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領域中，思想史的作品以許義雄等人有關清末民初中國體育思想的一系列著作<sup>29</sup>及徐元民所著之中國知識分子體育思想的一系列作品<sup>30</sup>最具代表性。許氏先後兩次前往日本攻讀學位，專攻體育學原理，對於日本體育聞人森有禮之體育思想著墨甚深，其後轉而研究中國近代體育思想，並將體育運動之現象及事實提升至文化、思想、價值層面進行研究，在深化體育運動價值上著力甚深，同時在開拓體育運動研究議題上亦成果豐碩<sup>31</sup>。徐氏師承許氏，兩者一脈相傳<sup>32</sup>，其在體育思想、傳統身體活動、體育史等領域上深耕有成，著作豐碩，亦甚重視體育運動史的治學方法，對體育運動文史研究之方法論涉入頗深<sup>33</sup>。許氏著作內容文章架構清晰，論證詳實完整，筆鋒犀利流暢，歸納敘寫極佳，對於史實背後所蘊涵深層涵意之詮釋，時常呈現其深厚的哲學視野。徐氏研究主張透過人文科學的探索與思辨，如文學、史學、哲學等，以追尋體育運動的根源與本質，明辨

<sup>27</sup> Carr, Edward H., *What Is History*, 35.

<sup>28</sup> 徐元民，〈體育思想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編）（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67-79。

<sup>29</sup> 中國體育思想史研究系列期刊發表成果頗多，多由許義雄及其學生發表。代表的著作如許氏十餘篇之期刊論文（請參閱參考文獻目錄），書籍成果則以許義雄等，《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一書為代表。

<sup>30</sup> 中國知識分子體育思想史系列作品成果亦頗多，以徐元民近十篇期刊論文（請參閱參考文獻目錄）及徐元民，《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臺北：師大書苑，1999）一書為代表。

<sup>31</sup> 從許氏研究成果中可發現其先後開發及涉獵的研究議題有職工體育、職工休閒、體育原理、體育哲學、課程與教學、體育政策、體育思想、運動文化、身體文化。

<sup>32</sup> 兩人曾合著《中國近代學校體育》上下冊，此書係許氏指導徐氏之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而在徐氏撰寫的相關書籍，如《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中國古代體育史》、《體育史》等書均可看到許氏所寫之序。

<sup>33</sup> 請參閱徐元民（編），《體育文史方法論》（臺北：師大書苑，1999）。

運動行為的是非善惡，著作體現著濃厚人文思考的底蘊。兩人分別服務於全臺唯二有體育博士班之學校，所培育之後輩亦頗多從事臺灣體育思想研究。

### 三、取向限制析論

不同的史學研究取向，有其自身不同的研究限制存在。就所謂「傳統史學」、「考據學式的史學研究」、「史料派的史學」、「科學主義的史學」、「材料主義史學」而言，史學研究欲科學化是其困難之一。雖然為擺脫神學及剪貼式的史學研究之限制，史學家力求在研究上要採用與自然科學研究一致的方法和精神，但仍會遭遇不少問題。史學在探討過去歷史時，多依據推理邏輯，然而對於同一個歷史現象，幾乎多數的史學家所推論到的結論都不一樣，這牽涉到每一位史學家的主觀意識<sup>34</sup>。史學研究雖講究歷史事實，但歷史事實的認定係由史學家認定，歷史研究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史學家主觀態度的影響，此點與自然科學研究所標榜的客觀性是相衝突的，而此點也連帶影響到史料真實性的問題。有學者就坦言，在史學研究上，歷史資料不僅保存的數量很少，而且主觀性強，使得史學研究難以邁入實證科學領域<sup>35</sup>。再則假設不易建立，史學家無法使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來建立假設及驗證假設。原因是與過去事件聯結的因素不易洞悉，無法確知是否為先前因素，此外大部分分歷史事件無法使用單一原因來解釋，史學家所指出的原因多是指重要或主要的因素而言<sup>36</sup>。史學研究的假設最初可能對問題的概念混淆不清，以致失諸廣泛，處理時也僅能按著順序，將

<sup>34</sup> 張華葆，《歷史社會學》，47。

<sup>35</sup> 張華葆，《歷史社會學》，47。

<sup>36</sup>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1990），278。

這些概念分別予以考驗，進而獲致簡單明確的結論或答案<sup>37</sup>。此方式是無法促使史學達到自然科學研究要求的必要條件。另一原因是專門術語無法統一，由於使用的語詞無法明確地界定，猶如自然科學般的操作性定義，則會造成研究觀念指涉上的問題，無法達成自然科學的要求。

史料派史學的另一個限制是無法滿足經世致用的需求。史料派史學家多致力於埋首考據整理史料，與外在環境的局勢演變無直接關係，其獲致之結論無法提供社會大眾的需求，甚至有時根本與現實完全脫節。歷史研究的目的應不只是考據過去事實，更重要的是搜尋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原則，以供經世之用；考據學雖然有它的貢獻，而且實事求是，但見樹不見林，所得結論只是零星片段的史實，無法湊合出一個完整的歷史結構，且過去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記錄太少，將這些片段資料收集整理，對於當時歷史現象的了解並無多大助益<sup>38</sup>。綜合來看，此取向研究對史料考證的過分強調，史料採用又獨尊官方文件，刻意迴避史家主觀無法去除的部分，其歷史知識客觀性的想法，受到了不少人的質疑，同時因證而不疏也限縮了歷史評述及歷史知識之實效價值。

體育運動史可說是研究過去有關人類體育活動的事實，當對所採用的史料有一番考證，確認其真偽，並詳述事件各項演變細節。但僅爬梳事件來龍去脈，詳述事件演變細節，並無法使人掌握事件的意義和影響，因此就需要體育運動史研究者來解釋其意，使人們得以清楚瞭解歷史事件之深刻意義。若僅陳述特殊歷史事件，詳述其演進之來龍去脈，由上所論已顯現其不足之處。同時，恪遵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迴避了史學中史學家主觀部分無法去掉的問題，限縮了史學家的評述，似也限縮了歷史知識的實效價值。

受 Collingwood 和 Carr 史學思想的啟迪，有一批史學家認為歷史研究

<sup>37</sup>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279。

<sup>38</sup> 張華葆，《歷史社會學》，11。

以考據為止境扼殺了史學研究空間，考據應只是研究過程，研究者應往前再有所解釋<sup>39</sup>。思想史研究者於是戮力於以人的思想經驗之持續與變遷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思想家或學派為主要研究焦點，以釐清思想源流、發展，並對思想在解釋、分析、批判及影響上有進一步之作為<sup>40</sup>。這類學者認為人類的歷史不是一直在進步，歷史演進定律及其客觀的決定因素並不存在，所有的歷史判斷均是相對的、主觀的、偏見的，沒有任歷史判斷是真實的。此種認為人人都是史學家的看法，引起不少爭議，為其限制之一。而研究時可能先假定一種立場或觀點來從事歷史解釋，更是受到判評，為其限制之二。此外，Collingwood 提出以歷史的想像 (historical imagination) 來重構歷史事實，雖然其提出這種想像不是武斷的或任意的，而是必需的，是把許多孤立而相關的證據連繫起來，想像其中發生過什麼事<sup>41</sup>。然而這種想像並無足夠的證據去說服質疑者，此為其限制之三。

體育思想史之研究，因其研究聚焦思想，是以除了對體現思想事實的具體證據的考證外，對思想的判斷、評價皆是由研究者依某一標準所為。研究體育思想史的學者雖然都有一套治史的方法，經由他們個人的專業與經驗，擁有一定的史觀與史識，以做為探研的理論基礎，但似乎沒有形成或建構出具普遍的研究模式或規範，因此有人人殊異的情形，其判斷和評價就不免令人質疑其作品的主觀性及創造性。此外，歷史事實及思想雖唯有經過價值之判斷，才能提供人們做決定的準據，研究成果才有其意義及實效價值，但研究者需透過對史料的分析、批判、解釋與重構，有時所持之觀點頗受持不同觀點者質疑。

有一些要走出傳統史料局限的史學家，他們的立論根據是某些預先設

<sup>39</sup> 蕭令杰，〈臺灣歷史社會學的發展（1960-199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19。

<sup>40</sup> 有關體育思想史之詳細內容，請參閱徐元民，〈體育思想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67-80。

<sup>41</sup> 有關 Collingwood 對於歷史想像的詳細討論，請參閱 Collingwood, Robin G., *The Idea of History*, 231-249.

定的理論，不見得是建立在實際資料上。他們在研究某個問題之前，就先預造了幾項「XX 史觀」或「OO 論」的大標題，然後把材料硬往裡塞，不管是否牽強附會，或者歪曲事實，只要能將材料安放在自己的分類之下就行了<sup>42</sup>。此部分在現今中國的體育運動史研究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抱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理論當作解釋史實之指標的情形相當明顯。甚至在討論體育史研究方法論的文章中直接指出「體育史研究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體育研究的方法論體系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論對體育史研究的指導」<sup>43</sup>。此種體育運動史學研究取向，為符合某一史觀或理論，硬將史料挑選、削減、再製，有違史學研究求真之精神，已自曝其短。在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中，並未發現此研究取向之作品，此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及學院主流學者傳承有關<sup>44</sup>。

綜合言之，依據上述不同的史學研究取向進行體育運動史研究，各有其限制存在，因此有必要再重回當代西方史學思潮中，探索不同於上述史學研究之進路，以探尋體育運動史更多元之研究取向。

#### 四、當代史學回顧

十九世紀末，法國學者 Henri Berr 力圖創建一種不同於 von Ranke 學派史學傳統的新史學，倡導綜合研究，其特徵體現在跨學科的歷史綜合研究中，也就是試圖把史學與其他學科統一起來，用來解釋歷史。Berr 認為 von Ranke 學派僅重視從史料，尤其是官方的、書面的史料，來研究歷史，

<sup>42</sup> 成中英，〈四度空間的作學問態度〉，《思與言》，8.1（臺北，1970.05）：3。

<sup>43</sup> 王素，〈體育史研究方法論思考〉，《體育文史方法論》（徐元民編）（臺北：師大書苑，1999），245。

<sup>44</sup> 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為防止共產主義思想對臺灣人民的侵入，曾禁止馬克思、恩格斯等與共產主義思想有關之書籍出版及流通。而當時在大學校院中，歷史研究走向及教學職缺，皆為史料學派學者所掌控，史觀派學者生存空間很小。

如此做充其量僅是挖掘歷的一個小角落，只有採用綜合研究才可克服史學研究的狹隘性和封閉性，使史學加強與毗鄰學科間之關係，以探求人類的進化和發展規律。為此 Berr 創辦了一份名為《綜合歷史評論》(*La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的刊物來落實其想法<sup>45</sup>。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國史學家 James Harvey Robinson 則十分強調史學的功用或實用價值，主張研究歷史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故反對 von Ranke 學派封閉性的史學，強烈主張史學家要利用關於人類的新科學知識，尋找新同盟軍，即其他社會科學，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將史學的知識擴大。他同時主張歷史的內容及範圍包含一切有關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想的事業，與留下的痕跡，大到民族興亡，小到個人習慣情感，而不只是局限於政治、外交及軍事事務。其跟隨者則更一進步地把它擴到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試圖在總體上建立人類文明史。是以 Robinson 在史學上主要的貢獻有擴展歷史研究領域，去除歷史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隔閡，提倡近代和現代史之研究，及強調歷史知識須具實效價值等四大面向<sup>46</sup>。

但真正促使西方史學研究脫離 von Ranke 學派史學傳統的則是法國史學家 Lucien Febvre 及 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兩人在 1929 年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此後這個標幟不僅在法國，也在整個西方史學的發展樹立了一個代表性的流派——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sup>47</sup>。但它並非一個嚴格的學派，僅是對於在史學研究

<sup>45</sup> 有關 Berr 更詳細的史學研究主張請參閱何兆武、陳啟能，〈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何兆武、陳啟能編)(臺北：五南，2002)，23-24。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79-80。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臺北：昭明，2001)，153-159。

<sup>46</sup> 有關 Robinson 更詳細的史學研究主張請參閱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1992)：163-169。何兆武、陳啟能，〈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24-25。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80-84。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147-152。

<sup>47</sup> 有關法國年鑑學派的介紹及論述，請參閱賴建誠，《年鑑學派管窺》(臺北：左岸文

典範上具有共同特點的人，一個不嚴格的集合名詞，其內部仍有種種差異，甚至歧異相當大，或許將它看成是一種運動、潮流或典範，比當成一個學派更適當<sup>48</sup>。

François Simiand 曾發表過一篇著名又爭議的文章，反對他所謂的史學家的三種部落偶像（idols），以駁斥他所謂的以事件為中心的歷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von Ranke 學派的三大偶像即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個人偶像（強調研究傑出個人的活動），及編年紀事偶像（按時間順序進行敘述）<sup>49</sup>。Febvre 及 Bloch 認為必須先破除這三個偶像始能建立新的史學研究。於是他們把注意力由政治史轉向經濟活動、社會組織、群體心態，努力嘗試把史學和社會科學結合在一起<sup>50</sup>。因而提出「整體歷史」概念，此種歷史包含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與 von Ranke 學派的史學倡導敘事史相反，年鑑學派強調問題史學，即提問、分析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並認為史學並非只是單一理論觀點，而是由千百種不同理論觀點結合而成，其趨向通則之建立<sup>51</sup>。但值得注意的是年鑑學派的史學理念傳布，並非通過他們的理論主張，而是通過一系統卓然有成，且能貫徹理念和主張的專書而傳遞的，如《命運：馬丁·路德》（*Un destin: Martin Luther*）、《國王與農奴》（*Rois et Serfs*）、《神跡皇帝》（*Les Rois thaumaturges*）、《景氣變動與世界經濟危機》（*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et la crise mondiale*）<sup>52</sup>。這些作品的共同點是打破政治史壟斷，開拓新的史學研究領域，同時使史學家的

化，2003）。

<sup>48</sup> 何兆武、陳啟能，〈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25-26。

<sup>49</sup>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11.

<sup>50</sup> 賴建誠，《年鑑學派管窺》，55。

<sup>51</sup> 張華葆，《歷史社會學》，29-30。

<sup>52</sup> 《命運：馬丁·路德》為 Febvre 作品 1928 年出版；《國王與農奴》及《神跡皇帝》為 Bloch 分別於 1920 年和 1923 年出版之作品；《景氣變動與世界經濟危機》則為 Simiand 作品，1932 年出版。年鑑學派相關重要著作之討論請參閱賴建誠，《年鑑學派管窺》，55-85。

興趣逐漸偏離傳統政治史而向社會史移轉，成為史學研究發展一股不可逆轉的風潮。

1960 年代以後，年鑑學派的研究趨向繁雜，沒有一種歷史研究的課題能夠概括其他史學家的工作，原被其摒棄的政治史，也開始被人用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而對大眾集合心理的研究，則更加深入和多樣，經濟與人口史的著作亦不斷冒出<sup>53</sup>。在英美兩國則興起所謂的「計量史學」，其特點是大量運用計量方法於歷史撰述中，是以其工作是圍繞著一堆統計數據而開展的；同時亦流行著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其目的在追溯人的行為發展，以揭示非理性因素對人行為的影響<sup>54</sup>。在年鑑學派所引起的新史學革新發展至巔峰時，其諸多矯枉過正的弊端及缺陷也浮現了，隨著靜態結構分析的加強，動態運動的研究被忽視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有聲有色的事件，被經濟發展、人口曲線、社會結構變化、生態環境取代了，即使有人的出現也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抽象的群體。於是 70 年代後期，敘事史又重新抬頭，但此種復興僅是對新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所進行的一種調整和修正，而非重新回到傳統史學的經驗主義敘事史<sup>55</sup>。

自 80 年代後期以來，原本被冷落的思想史研究又有復興的傾向，但其眼界則從聚焦偉人、英雄，轉為關注下層人物的活動，並力圖將歷史人物採用的語言，還原當時的環境，以求精確地理解其含義，這一趨勢導致史學家注意到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民俗學和比較文化學等各種方法，並採用新的方法和理論，重塑歷史研究之風格，以求更具體、更多面地反映人類歷史的進程<sup>56</sup>。然而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史學家亦開始以多元觀點、多層次探索人類社會複雜的原理，這支新軍刻意標榜：歷史雖然處

<sup>53</sup> 詳細論述請參閱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199-232。

<sup>54</sup>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文化，1998），348-351。

<sup>55</sup> 針對年鑑學派引發之問題及修正之陳述，請參閱何兆武、陳啟能，〈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36-42。

<sup>56</sup>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355-356。



理過去，但無法重建過去、過去是論述的組構、歷史是過去的再現等激烈主張。他們並採文哲學者一對有用分析工具語言，即文本（text）和論述（discourse），來從事史學研究，認為史學研究工作是一種面對過去的工作，過去是難以掌握的，故而也開始借用文本和論述的工具術語從事史學研究<sup>57</sup>，同時宣稱研究者在處理文本，研究工作則是在處理論述<sup>58</sup>。此種觀點可由 Jenkins 對於歷史所下定義清楚得知：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過去。它是由一群思想現代化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的這些工作者都是受薪者）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用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適得其所的方式。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會一連串的被使用及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的意義<sup>59</sup>。

因而，研究者的作品僅是再現過去，對現存少數的文獻做組構，每位研究者對於過去的組構角度不同，自然有不同的歷史作品產生，這些作品所形成的知識就會變得多元化，而歷史就在此種多元化的「過去再現」，或「論述的組構」中，逐漸給予人們一個清楚的立體形象。

<sup>57</sup> 有關後現代史學之介紹請參閱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357-361。Jenkins, Keith,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sup>58</sup> 盧建榮，〈導讀後現代歷史學指南〉，《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臺北：麥田，1996），12。

<sup>59</sup>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26.

## 五、研究進路提擬

### (一)趨勢與轉變

von Ranke、Collingwood 和 Carr 的史學觀點在年鑑學派盛行的年代，仍是史學研究的主流思想之一，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末，開始有人提出強烈的質疑。Laqueur 和 Mosse 即提出：現代史學不分流派，都主張線形的進步觀，都以為社會是在合理性基礎下運作的<sup>60</sup>。如此單一的觀點，是否能夠徹底探索人類複雜的社會，令人存疑，人們需要以更多元的觀點，及更多層次的探索，才能更加瞭解複雜的人類社會。因此，在提倡社會史學的陣營中一支求變殷切的新軍，開始挑戰主流傳統，標榜「歷史雖然處理過去，但歷史無法重建過去」、「過去是論述的組構」及「歷史是過去的再現」等主張<sup>61</sup>。由此觀之，歷史既是史學家透過想像所建構的過去，有別於真正發生的過去，歷史就絕不會是過去的重現，而只是一種論述，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因而歷史知識的產生，就從單一中心朝向多元中心邁進了。

在臺灣 1970 年代後，由《思與言》、《食貨月刊》、《史學評論》等期刊的推動下，史學研究有了不同的趨向，開始有史學與其他學科結合的討論和實驗，將史學研究的焦點從古代史延伸到近代史研究上，拓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會有這樣的變革，除了對當時臺灣史料學派研究的反思外，亦受 1960 年代以來年鑑學派主張所影響<sup>62</sup>。此種影響在臺灣史學界引發

<sup>60</sup> 盧建榮，〈導讀後現代歷史學指南〉，《歷史的再思考》，10。

<sup>61</sup> 盧建榮，〈導讀後現代歷史學指南〉，《歷史的再思考》，11。

<sup>62</sup> 有關臺灣 1970 年代後史學研究趨向更詳細之陳述，請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 1950-2000》，43-96。

相當鉅大的回響，開始有學者進行史學研究方法論之深究及探討<sup>63</sup>，但是這種回響在當時體育運動史研究領域中，卻未引發太大的火花<sup>64</sup>。直至 1999 年《體育文史方法論》一書之出版，才有此類探討體育運動史學方法論專書，惟內容係編纂中國學者相關文史哲論文，僅編者為臺灣學者<sup>65</sup>。

近年來，開始有人觸及史學方法論及年鑑學派的史學理念，如 2005 年出版之《體育史》一書，在〈體育史概論〉一章中稍有觸及方法論及思潮之改變<sup>66</sup>，以及 2006 年有關英國運動史研究，和第九屆國際體育與運動史學研討會的討論文章<sup>67</sup>。這些論文開始注意到，英國體育運動史研究方法雖根植於史學研究方法，但會借鑑社會學研究方法，且吸納其他學門研究方法，並認為英國式的運動社會史學跨學科研究，可以做為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之借鏡。而從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來看，體育運動史研究有相當明顯跨領域的趨勢，即將文史哲的人文學科，與各種社會科學，包括歷史社會學、歷史哲學、歷史政治學等，做整合性的探討。這些研究

<sup>63</sup> 如楊懋春，《史學新論》（臺北：華新，1974）。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1976。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1978）。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1979）。李弘祺等，《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1980）。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1980。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1981）。以及《歷史月刊》、《食貨》、《思與言》、《史學評論》等期刊中有關史學方法論之討論文章。

<sup>64</sup> 考察體育運動相關期刊並無發現史學方法論及年鑑學派相關主題之論文發表。另考察有關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之回顧及展望之論文，亦僅提到史學方法論議題需加以重視與開發，但仍無相關論文之深入探論。此類回顧及展望之論文有范春源，〈戰後臺灣地區體育史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體育學報》，17（臺北，1994.08）：59-74。邱金松等，《體育學門之規劃研究》（未出版，1997）。蔡禎雄、李加耀，〈我國體育史學研究趨勢及其重點規劃〉，《體育學門趨勢與課題重要研究規劃》（許義雄編）（未出版，1998），138-151。林玟君，〈回頭看臺灣體育史〉，《國民體育季刊》，28.3（臺北，1999.09）：54-62。王建臺，〈臺灣體育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36.2（臺北，2007.06）：7-12。蔡禎雄，〈體育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47-66。

<sup>65</sup> 徐元民（編），〈作者簡介〉，《體育文史方法論》。

<sup>66</sup> 徐元民，《體育史》，1-13。

<sup>67</sup> 請參閱許光庶，〈英國運動史學研究之目的、內容及方法之探討〉，《中華體育季刊》，20.1（臺北，2006.03）：83-89。徐元民，〈體育史學的新風貌：2005 年第 9 屆國際體育與運動史學術研討會綜評〉，《大專體育》，82（臺北，2006.02）：61-66。

方法上的觀點，很明顯地，係受年鑑學派等提倡總體的、綜合的新史學思潮所影響，此種強調提問及分析的體育運動史研究，近來的兩本碩士論文《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時期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可視為此類研究，兩者皆提出殖民主義對身體的控制之問題，並試圖藉由殖民地化、文明化及國家化的主軸，來分析及闡釋日本殖民政府如何控制人民的身體<sup>68</sup>。另有專攻運動歷史社會學的學者已出版多篇此類作品，這些論文以社會學議題及概念為焦點，如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社會主義等，使用史料來進行各項分析，以回答其所提出之問題<sup>69</sup>。

## (二)擴增與提擬

綜合來看，總體的和綜合的史學觀點在西方史學中已發展茁壯，在臺灣史學的研究中亦已受到許多學者大力推行。然而在臺灣的體育運動史學領域中，仍屬剛萌芽，並未成氣候，其原因除了與學院派研究者師承，及領域缺乏史學方法論之討論有關。此外，應與史學思潮改變的本質也有關。此種研究本質的變革，若無法從研究取向的核心價值概念，做一觀念上全盤的改變，是相當難以推展的。因為上述史學研究的改變，並非只是研究方法上的變革，而是一種研究取向上核心價值的根本性轉變。借用歷史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觀術語「典範」(paradigm)<sup>70</sup>來說，是一種史學內

<sup>68</sup> 請參閱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新竹：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黃怡玲，〈日治時期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5。

<sup>69</sup> 請參閱 D. J. Hwang, "Sport and Imperialism," *Chung Yuan Journal*, 26.2 (Taoyuan, May, 1998): 67-74. Tony D. J. Hwang, "Sport, Nationalism and Early Chinese Republic 1912-1927," *The Sport Historian*, 21 (London, November, 2001): 53-70. Tony D. J. Hwang, "Sport, Social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78," *Chung Yuan Journal*, 33.4 (Taoyuan, December, 2005): 783-800. Tony D. J. Hwang, "Sport, Imperi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Empire 1860-1911," *Sport Studies*, 2 (Taipei, September, 2007): 83-132.

<sup>70</sup> 「paradigm」一詞係由美國科學哲學家 Kuhn 所提出，中文翻譯詞彙頗多，「典範」、「範型」、「範式」、「派典」等均是。相關資料請見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中譯版有孔恩

部研究典範的轉移。典範意指一種代表科學社群成員研究上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手段等的總和。具體地說，它可以被理解為某一科學社群在某段時間內，從事研究活動時所共享的基礎和準則。故若僅局部改變其研究方法，而不同時修正其研究取向核心價值，則方法與價值間將出現扞格不入之現象，因價值為方法之導引，方法為價值之體現。

若將典範概念其借用在史學研究變革的分析上，不同史學研究取向的不同之處，大致上會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寫作型式、學科關係等面向上。表一為三種研究取向差異之分析。在研究對象上，科學的取向傳統上以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為主，相對的取向則以聚焦思想史，總體的取向則著眼文化史和社會史。在研究方法上，科學的取向著重內外考證，且證而不疏，相對的取向則在考證外，加上判斷及詮釋，總體的取向則先行提問、再分析，有些則會使用計量方法。在寫作型式上，科學的取向採敘事型式，對史實進行客觀描述和敘寫，相對的取向則除了敘事外，會加上研究之論斷及評價，總體的取向則是以結構分析型式寫作。在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上，科學的取向師法自然科學，排拒哲學的介入，相對的取向則融入人文及哲學思考及內容，總體的取向則是結合一票社會科學的同盟軍，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

綜合的和總體的史學研究取向，結合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強調提問及分析的研究成果，不僅補足上述史料派、史釋派及史觀派研究取向上的不足，更「可探尋過去與現在、事件與過程、行動與結構的相互滲透和交融」<sup>71</sup>，值得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者多多開發及借鏡，以深化臺灣體育運動史之研究成果。

---

(Thomas Kuhn) 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臺北：遠流，1994)。

<sup>71</sup> Dennis Smith,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 3.

表一 三種史學研究取向差異分析表

研究取向 差異層面	科學的、客觀的	相對的、反客觀的	總體的、綜合的
研究對象	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	思想史	文化史、社會史
研究方法	內外考證、證而不疏	考證、判斷、詮釋	考證、提問、分析、計量
寫作型式	敘事、客觀描述和敘寫	敘事、論斷、評價	結構分析
學科關係	師法自然科學、排拒哲學	融入人文及哲學	結合社會科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六、結論

從上述的考察發現，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從荒蕪到現今成果豐碩，實有賴所有前輩及學者辛勤的耕耘與奉獻，尤其是史學研究要有一點成果，並非一朝一夕、一人一系可以完成，必需集眾人之力始可一窺堂奧。從以往的成果分析，多數成果之研究取向集中於採科學的和客觀的史學觀點之史料學派，及持相對的和反客的史學觀點之史釋學派——至於以某一理論來解釋某一歷史的史觀學派，以及持總體的和綜合的史學觀點之研究，則相對稀少。但是，由上文分析中已發現，不論史料派、史釋派、史觀派的觀點，均後設歷史為一直線的發展形式，在此種觀點下評定史學成果是單一的和獨尊的標準。

但自從 Berr 的綜合歷史觀、Robinson 的新史學論點、法國年鑑學派的研究趨向、計量史學、心理史學、新敘述史、後現代史學……等不同以往的史學觀點提出後，歷史已不再被認為是之前的直線發展形式，單一的、獨尊的觀點，而是朝向多層次、多視角、多元性、多樣貌的立體觀點

轉進。此種轉進使史學家的研究觀念產生根本性之變革，而此種變革使用科學哲學言來說，是一種史學研究典範的轉移，若不從核心的研究價值上做轉換，僅從方法上酌予修正，將會有價值與方法扞格不入的情形產生。綜合的和總體的史學研究取向，認為歷史是一種立體的形象，研究者可從多元的視角切入，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所欲探究之問題進行回答，綜合性地及總體性地來瞭解所欲探究議題之全貌。是以，本文提擬在現有的研究取向之外，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應再擴增綜合的及總體的史學研究取向，跨領域地與各種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做整合性的探討<sup>72</sup>。尤其是體育運動已深入每個人生活的同時，應廣納社會學的結構與方法，進行跨體育運動學術研究領域內各學門的綜合性研究，及跨越學科高牆，進行總體性和綜合性的史學研究，以激發更新的研究成果，拓展體育運動史的領域，深化史學研究的影響力。

## 參考文獻

- 孔恩 (Thomas Kuhn) 著，《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臺北：遠流，1994。
-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1990。
- 王建臺，〈臺灣體育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36.2 (臺北，2007.06)：7-12。

<sup>72</sup> 本文雖提擬綜合的和總體的體育運動史學研究取向，但並無貶抑及摒棄臺灣體育運動史不同取向研究社群之意。因每種研究取向皆有其優點和缺點，不同時代、立場、學者亦有不同之觀點，現存之研究取向早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實不容抹殺，只是若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多一種研究視角，當可更深化及廣化臺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成果。

- 王素，〈體育史研究方法論思考〉，《體育文史方法論》，（徐元民編），臺北：師大書苑，1999：243-250。
-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臺北：麥田，2002。
-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文化，1998。
- 成中英，〈四度空間的作學問態度〉，《思與言》，8.1（臺北，1970.05）：1-4。
- 何兆武、陳啟能，〈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何兆武、陳啟能編），臺北：五南，2002：1-42。
-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1976。
-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1988。
-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臺灣商務，1967。
- 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臺北：三民，1981。
-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1957。
- 李弘祺等，《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1980。
- 李建興、劉宏裕、陳耀宏，〈蔡禎雄體育運動史方法論建構之敘說研究〉，《2009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康世平主編）（臺北：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2009），99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1979。
- 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1980。
- 周樑楷，《歷史學的思維》，臺北：正中，1993。
- 林玫君，〈回頭看臺灣體育史〉，《國民體育季刊》，28.3（臺北，1999.09）：54-62。
- 范春源，〈戰後臺灣地區體育史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體育學報》，17（臺北，1994.08）：59-74。
- 徐元民（編），《體育文史方法論》，臺北：師大書苑，1999。
- 徐元民，〈吳蘊瑞的體育思想〉，《體育學報》，26（臺北，1998.12）：9-16。
- 徐元民，〈尚樹梅的體育思想〉，《體育學報》，27（臺北，1999.09）：11-20。



- 徐元民，〈秋瑾體育思想之特質〉，《國立體育學院論叢》，4.2（桃園，1995.04）：63-73。
- 徐元民，〈胡適的體育思想〉，《體育學報》，23（臺北，1997.09）：1-12。
- 徐元民，〈徐一冰的體育思想〉，《國立體育學院論叢》，9.2（桃園，1999.04）：1-20。
- 徐元民，〈張之洞的體育思想〉，《國立體育學院論叢》，6.1（桃園，1996.04）：117-130。
- 徐元民，〈張伯苓的體育思想〉，《國立體育學院論叢》，9.1（桃園，1998.10）：27-43。
- 徐元民，〈程登科的體育思想之特質〉，《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1.2（桃園，2001.04）：29-41。
- 徐元民，〈董守義的體育思想〉，《體育學報》，25（臺北，1998.07）：1-10。
- 徐元民，〈蔡元培的體育思想——以民元教育宗旨為中心〉，《體育學報》，16（臺北，1993.12）：37-49。
- 徐元民，〈戰后初期中國體育思想之形成（1945-1949）〉，《體育學報》，14（臺北，1992.12）：15-32。
- 徐元民，〈戰時中國體育思想之研究（1937-1945）〉，《體育學報》，13（臺北，1991.12）：35-46。
- 徐元民，〈嚴復的體育思想〉，《體育學報》，18（臺北，1994.12）：13-23。
- 徐元民，〈體育史學的新風貌：2005年第9屆國際體育與運動史學術研討會綜評〉，《大專體育》，82（臺北，2006.02）：61-66。
- 徐元民，〈體育思想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發展中心編），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67-80。
- 徐元民，《中國古代體育史》，臺北：品度，2003。
- 徐元民，《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臺北：師大書苑，1999。
- 徐元民，《體育史》，臺北：品度，2005。

- 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臺北：昭明，2001。
- 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1981。
- 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1978。
- 張華葆，《歷史社會學》，臺北：三民，1993。
- 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
- 許光熙，〈吳文忠的學術成就及其《體育史》所蘊涵的史學理論〉，《國立臺灣體育學報》，2（臺中，1998.06）：29-68。
- 許光熙，〈英國運動史學研究之目的、內容及方法之探討〉，《中華體育季刊》，20.1（臺北，2006.03）：83-89。
- 許義雄，〈二十世紀期初中國體育思想在國民教育中之成立過程〉，《亞太地區育健康休閒活動會議手冊》，未出版，1975：18-22。
- 許義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研究〉，《筑波大學體育研究室報》，15（東京，1992.06）：1-32。
- 許義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特質〉，《體育學報》，12（臺北，1990.12）：1-8。
- 許義雄，〈中國近代體育概念之形成〉，《臺灣體育》，51（臺北，1990.09）：25-30。
- 許義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形成〉，《體育學報》，9（臺北，1987.12）：1-8。
- 許義雄，〈近代中國民族體育思想形成之背景〉，《臺灣師大體育研究》，2（臺北，1996.06）：45-58。
- 許義雄，〈秋瑾與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師大體育》，27（臺北，1989.02）：15-20。
- 許義雄，〈徐一冰體育思想之形成〉，《臺灣體育》，39（臺北，1988.11）：17-20。
- 許義雄，〈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的探討〉，《體

- 育學報》，10（臺北，1988.12）：7-17。
- 許義雄，〈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發展〉，《體育學報》，13（臺北，1991.12）：1-14。
- 許義雄，〈清末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淵源（上）〉，《大專體育》，1（臺北，1991.04）：111-121。
- 許義雄，〈清末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淵源（下）〉，《大專體育》，2（臺北，1991.06）：83-99。
- 許義雄，〈麥克樂與近代中國體育〉，《臺灣體育》，49（臺北，1989.03）：73-81。
- 許義雄、徐元民，《中國近代學校體育上下冊》，臺北：師大書苑，1996。
- 許義雄等，《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
-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史研究方法論集》（臺北，1974）：147-159。
- 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臺北：心理，2001。
- 黃怡玲，〈日治時期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5。
-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1992。
- 楊懋春，《史學新論》，臺北：華新，1974。
- 歐宗明，〈近代西方史學思潮變遷（1830-1980）〉，《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3.2（臺南，2009.10）：61-76。
- 蔡禎雄，〈體育史〉，《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臺北，2007）：47-66。
- 蔡禎雄，《日據時期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
- 蔡禎雄，《日據時期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 盧建榮，〈梁啟超，您安息吧——新歷史研究法讀本的出爐〉，《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2002）：7-16。
- 盧建榮，〈導讀後現代歷史學指南〉，《歷史的再思考》（臺北，1996）：7-36。

- 蕭令杰，〈臺灣歷史社會學的發展（1960-199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 賴建誠，〈年鑑學派管窺〉，臺北：左岸文化，2003。
-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 蘇瑞陽，〈體育宿耆——吳文忠博士〉，《國民體育季刊》，20.3（臺北，1991.09）：54-59。
- Bloch, Marc,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Peter Putn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 Burke, Peter,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 Carr, Edward H.,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 Collingwood, Robin G.,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Hay, Cynthia, "What Is Sociological History," *Interpreting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Ed. Stephen Kendrick, Pat Straw & David McCro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20-37.
- Hwang, D. J., "Sport and Imperialism," *Chung Yuan Journal*, 26.2 (Taoyuan, May, 1998): 67-74.
- Hwang, Tony D. J., "Sport, Imperi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Empire 1860-1911," *Sport Studies*, 2 (Taipei, September, 2007): 83-132.
- Hwang, Tony D. J., "Sport, Nationalism and Early Chinese Republic 1912-1927." *The Sport Historian*, 21 (London, November, 2001): 53-70.
- Hwang, Tony D. J., "Sport, Social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78," *Chung Yuan Journal*, 33.4 (Taoyuan, December, 2005): 783-800.
- Jenkins, Keith,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Smith, Dennis,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